

冯天瑜○主编

人文論叢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办

CSSCI 收录集刊

2012 年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洪天輪日本語

人文精神 與社會

■ 由日本學者、社會運動家、文學家、電影導演、藝術家等所發起的「人文精神與社會」研討會

人 文 精 神 與 社 會



| 2012 年 6

冯天瑜◎主编

人文論叢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办

CSSCI 收录集刊

2012 年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文论丛(2012年卷)/冯天瑜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11
ISBN 978—7—5161—1759—0
I. ①人… II. ①冯… III. ①社会科学—2012—丛刊
IV. ①C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79009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 媛

责任校对 徐 楠

责任印制 李 建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35.25

字 数 572 千字

定 价 8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委会名单

学术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卜松山 瓦格纳 艾 兰 池田知久
刘纲纪 朱 雷 谷川道雄 李学勤
杜维明 庞 朴 宗福邦 饶宗颐
章开沅 谢和耐 裴锡圭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冯天瑜 刘礼堂 李维武 陈文新
陈庆辉 陈 伟 陈 锋 吴根友
沈壮海 张建民 杨 华 杨逢彬
罗国祥 尚永亮 郭齐勇

主编 冯天瑜

副主编 郭齐勇 陈 锋 陈文新 杨 华

执行主编 陈 锋

执行编辑 洪 均

目 录

人文探寻

论湖北文化的特点和影响	罗运环(3)
东西方早期“和谐”思想略论	
——柏拉图和先秦诸子对“和谐”的思考及其它	彭 池(24)
《礼记》文本中“刑”字哲学意涵新探	张志强(44)
“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新解	曹印双(54)
秦汉服色制度的历史轨迹	曾 磊(61)
论《诗源辩体》的汉魏诗学观	龚 贤(73)
清代段顾之争平议	任慧峰(80)
从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视角看清朝的覆亡	蔡双全(95)

明清经济·社会

历史自然灾害记载与灾害史研究

——以明清时期为例	张建民(113)
试论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卖妻	王美英(125)
国家、堤防与社会:明清两湖水利事业中的国家介入与区域协作	
——以四邑公堤为中心的考察	杨国安(139)
清代食盐的生产方法	陈 锋(162)
鄱阳湖流域水利纠纷与地方秩序	
——以乾隆年间江西奉新、靖安两县洋壕堰文案为例	廖艳彬(182)

清代川江航运业中的纠纷与滩务管理	陈新立(193)
近代两湖地区的工业格局	任 放(219)
张之洞振兴两湖茶务举要	杜七红(261)

历史文化语义学

“汉字文化圈”概念在日中两国的形成过程	冯天瑜(275)
近代“心理学”的厘定与中西日文化互动	聂长顺 王淑贞(287)
试析刘锡鸿《英轺私记》中的“议会”	余冬林 任群英(304)
“义务”学名的厘定	杨玉荣(314)
“教科书”译名的近代厘定	彭雷霆 谷秀青(328)
“私法”概念在晚清的转变与传播 ——兼论清末新律中的“个人”观念	刘 耀(339)

文史考证

上博楚简《武王践阼》文本结构初探	何有祖(355)
《民之父母》中的三五之辨 ——兼论《民之父母》、《孔子闲居》、《论礼》之异同	吴默闻(363)
顾嗣立《闻丘先生自订年谱》考略	张立敏(374)
《𬨎轩语》校记	司马朝军(389)

刘永济著述整理与研究

大师的风范

——刘永济先生的学术与人格	吴志达(409)
刘永济先生手稿《南史提钩》研究	吕华明(415)
刘永济先生的文学史理论 ——《十四朝文学要略·叙论》发微	鲁小俊(429)
刘永济先生未刊诗(6首)笺释	王焕林 邱亮(438)
“刘永济著述整理与研究学术研讨会”纪要	江俊伟 殷建奇(446)

近代文化

- 以日为师：早期《北洋官报》中所见日本新知略论 姜海龙(459)
近代日本对辛亥革命性质的认识及其影响 王美平(475)
刘咸炘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 欧阳祯人(486)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古典通俗小说研究范式的确立
——以明代“四大奇书”为例 余来明 黄 荣(497)

学术述评

- 近百年晚清长江中游地区漕政研究综述 洪 均(513)
台湾地区苏东坡词研究述论 [中国台湾]潘金英(522)
清代部费问题研究综述 张 晨(532)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大事记
(2011年1—12月) 李小花(544)

人文探寻

论湖北文化的特点和影响^{*}

罗运环

政区文化史属于地域文化学的一种类型，^[1] 即以现今一定政区如省域范围，探讨该地域过去的文化。21世纪以前主流的地域文化研究是以历史文化圈域为单位的文化史研究，^[2] 进入21世纪以后，适应建设文化强省（市）的需求，政府和学者都很重视以省域为单位的政区文化史研究，随之，以省域为主的政区文化史研究便逐渐开始取代以历史文化圈域为单位的文化史研究的主流地位。

湖北文化史研究，正是随着政区文化史研究的热潮而兴起。从现有状况来看，在湖北文化研究中诸如文化生态环境、文化中心（重心）的转移、文化特点、文化的地位和影响等，这些较重大的问题尚须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将就这些问题作些探讨。

一 生态环境的独特性

（一）地域认同与湖北文化地域的形成

作为政区的湖北文化，是以现今的政区范围，即省域为基点，探讨过

* 本文受到武汉大学“湖北研究”专项项目“楚文化精神研究”（20110103）的资助。

罗运环，武汉大学中国地域文化研究所所长，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1] 罗运环、张丹、吴国恒、杨山坡：《中国地域文化研究三十年》，载冯天瑜主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 罗运环：《中国地域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人文论丛》（1998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罗运环、张丹、吴国恒、杨山坡：《中国地域文化研究三十年》，载冯天瑜主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去的文化（以辛亥革命为下限）。故先考察湖北文化的地域，即现今湖北政区的形成问题。

湖北政区虽然成形于清代，完善于民国，但最初的基础是在先秦楚国时代。从商末到战国晚期秦将白起拔郢（前278），湖北纳入秦国版图为止，约800年间，楚国虽曾拥有半天下，但其首都在湖北，湖北一直是楚国的腹地，是经济文化昌盛之地。这个中心区便成为后世的一种地域认同，即“楚”或“荆楚”，为日后湖北政区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另一个对湖北政区产生深远影响的是汉末“荆州”建立。荆州之称最早见于《尚书·禹贡》九州之中，汉武帝在全国设十三州部中有荆州刺史部，虽为一种巡视监察区，但已有了明确的地域，经三百余年的发展，到汉末朝廷实行州、郡、县三级制，荆州便成为名副其实的一处地方最高行政组织。湖北属于荆州，刘表首任荆州牧，治所就在湖北的襄阳（今襄阳市）。后来治所多在江陵（今荆州市区），从而在故楚腹地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了荆州地域观。三国时期，魏吴南北对峙，分设荆州，谁都不愿更改他名；西晋统一后，合二为一，袭用“荆州”旧名，初治襄阳，后移治江陵，湖北的郡县大体都在西晋荆州之域。东晋至元代，若南北对立，湖北则为武力所分割，若南北一统，则大都为若干高级地方行政体制所分开，似乎独立的荆州已不复存在。明代，朱元璋洪武九年（1376），调整所承袭的元代行省，再次恢复汉荆州的地域，正式名称为湖广承宣布政使司，在习惯上称“湖广行省”或“湖广省”。同时，在明代官私文书中，人们习惯称湖广地域为“荆楚”，明后期还出现了“楚省”的简称，湖北在楚省之内。这些都体现出荆楚的地域认同，这种地域认同是一种综合性指标。正是这种认同，荆楚地域分久必合，为湖北政区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基础。

清初沿用明制，置湖广行省。康熙三年甲辰春三月，壬申（初十），即1664年4月5日，湖广布政司（省）分立为左右二布政使司（省）。“以湖广武昌、汉阳、黄州、安陆、德安、荆州、襄阳、鄖阳八府，归湖广巡抚管辖。”康熙六年（1667），湖广左布政使司改名为“湖北布政使司”。雍正初年，又改“湖广巡抚”为“湖北巡抚”。湖北省正式建省，省会武昌。

湖北正式建省，将省会定在武昌（今武汉市武昌），虽几经改朝换代，一直到现今没有变动。值得注意的变化主要是武汉市的成立。1926年秋，北伐军占领武汉三镇，年底国民党党政联席会议“确定国都，以武昌、汉

口、汉阳三城为一大区域，作为‘京兆区’，定名‘武汉’”。1927年4月16日宣布武汉三镇合一，市政机关正式成立；4月18日武汉市政府正式成立。此后，湖北省省会虽仍驻武昌，但因武汉市的成立而有“武汉”之称。

湖北建省之初，其所领“八府”，包含了今湖北除鄂东北的英山县、鄂西南的建始县之外的全部政区，湖北政区范围大体定型。此后，清乾隆元年（1736）将建始县从四川省夔州府划入施南府；民国年间，即1932年，又将安徽安庆的英山县划归湖北，至此湖北政区范围定型而无大的变化。这一政区正是我们研讨湖北文化的地域范围。

（二）地理环境的过渡性

湖北处于中国地势第二级阶梯向第三级阶梯的过渡地带，鄂西山地为第二级阶梯的东部边缘，鄂西山地以东属于第三级阶梯。地势总体西高东低，最高点是西部神农架高峰神农顶，海拔3105米，号称“华中屋脊”，最低点是东边黄梅龙感湖湖底，海拔仅10米。因其西部为鄂西山地，东北至东南有桐柏山、大别山、幕布山等山地丘陵环绕，中部尤其是中南部江汉平原地势较低，湖北的整体轮廓略呈向南开放式椭圆形盆地。

湖北地貌过渡性特点明显。地势起伏大，地貌类型复杂多样，有平原、岗地、丘陵、山原、山地。在18.59万平方公里的总面积中，平原湖区占20%、丘陵岗地占24.5%、山原和山地占55.5%，山原和山地多于平原湖区和丘陵岗地。

按地形地貌的特点，以丹江口—荆门—宜昌—松滋一线为界，湖北可大分为二区，此线以西为鄂西山地，此线向东则为鄂中鄂东地区。若细分则可为七区，鄂西山地细分为鄂西北山地、三峡谷地、鄂西南山原；鄂西山地以东可细分为鄂北平原岗丘、鄂东北低山丘陵、鄂东南低山丘陵、江汉平原。

这种过渡性地理特点，虽可细分为七区，但差异性较明显一些的是鄂西山地与江汉平原为代表的山地和平原。鄂西山地是由一系列山脉组合而成的山群，山群间多河谷盆地。鄂西北名山武当山脉为秦岭东延南支，其北有限西至丹江口的汉水谷地及郧县盆地；其南为竹溪至房县断陷盆地及谷地；神农架及荆山为大巴山山脉东延部分，是汉水与长江的分水岭。鄂西南山原区，属于云贵高原的东北延伸部分。除东部边缘外，山顶海拔

1000—2000米，地势高耸，万山重叠，山顶平缓宽阔，高下参差，建始、恩施等盆地坐落其间，山坡陡峭，窄谷幽深，是谓“山原”。八百里清江从中部切入，形成鄂西南最大河谷，湖北第三大河流，著名的利川腾龙洞、恩施大峡谷为其上游段落。三峡谷地，处于鄂西北山地与鄂西南山原之间，长江从中横向切入，造成近200公里的举世闻名的大峡谷，称之为三峡，其中巴东至宜昌段在湖北境内。江汉平原，是由长江与汉江反复冲积而成。据调查，大体钟祥以南，西自沙市，东至汉口，江河泛滥，汉江下游河道常常变迁，大规模开发利用，大约是在南宋晚期垸田出现之后。

这种山地与平原地理上的差异，在文化上也存在一些明显的反映。以葬俗为例，山地人葬俗虽有多种，悬棺葬只能存在于山地，如古代巴人曾有悬棺葬的习俗，在三峡地带的神农溪、雾渡河等地都有所发现，秭归的棺木峡，据《邵伯温闻见后录》所载：三峡中石壁千万仞，飞鸟悬崖不可及之处，有洞穴累棺椁，或大或小，历历可数。如此险峻绝壁，安放棺木，难度之大，令今人难以想象。平原通行土葬，攀比求厚，劳民伤财，故有“节葬”之倡。凡此等等，表明地理差异对文化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三）气候条件的过渡性

湖北总体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北部接近我国北亚热带的北界，南部跨越中亚热带的北界（从三峡谷地向东沿长江一线至鄂东河谷地带及鄂东南地区属于“中亚热带”气候），具有从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的特征。在历史上不同时期，因气候变化，这一中亚热带北界线有所摆动。如果不明了这一点，历史上许多相关文化现象难以理解，如《史记·货殖列传》：“蜀、汉、江陵千树橘。”《新唐书·地理志》：江陵府江陵郡“土贡……柑、橘……梔子”；襄州襄阳郡“土贡……漆器……柑”。但现在产柑橘的仅在湖北南端中亚热带，主要是三峡河谷地区。柑橘对温度要求较严，适应其生长的温度范围为13℃—37℃。柑橘不耐寒，抗寒能力极端气候最低限度根据不同品种不能超出-3℃—9℃，表明汉唐时期荆州、襄阳气温接近现今的三峡谷地。如今襄阳和江陵（荆州）地区的气温下降而不能生长柑橘，若以现在的情况机械地比照以上的文化内容就难以理解了。又如，三峡河谷地带，虽然历史上气温多变，没见有降于中亚热带线以下的情况，故素

以盛产柑橘著称，先秦时代屈原楚辞专有《橘颂》一篇，唐代时也有柑橘作为土特产进贡朝廷的记载。凡此等等都说明气候在文化生态环境中也是不可忽略的内容。

（四）交通地理的枢纽性

湖北在北纬 $29^{\circ}05'$ — $33^{\circ}20'$ 、东经 $108^{\circ}21'$ — $116^{\circ}07'$ 之间，处万里长江中游，居华中之中，毗邻河南、湖南、安徽、重庆、陕西、江西六个省市。这种中心区位决定了它的交通的枢纽性。

历史上对湖北经济文化发展影响最深刻的交通路线，主要有两条，其一是连接中原与湖湘及岭南、云贵的南北交通干线，即荆州到襄阳间的主干道，简称荆襄古道；其二是连接吴越与巴蜀的东西交通干线，即长江水道。

荆襄古道，此道可水（汉江加古扬水或古夏水）陆并行，是贯通湖北中部南北的主干道。沿此道北上经南阳（今河南南阳市）出方城，可交通中原，或经中原交通北京；沿此道经南阳向西行，入武关，可交通关中；沿此道过长江向南，近可进入湖湘腹地，远可交通岭南（两广）；向西入沅江，则可交通云贵。古代中央王朝的都城大多定在北方，或在关中，或在中原，或在北京。连接南北的荆襄古道至关重要，它既是朝廷与地方的重要交通要道，也为湖北经济文化的交往提供了方便。得风气之先，在这条连接南北荆襄古道两端的荆州（包括沙市）和襄阳（包括樊城）率先发达起来，先后成为湖北最早的两大中心城市和文化中心。

长江自西奔腾而来，穿入三峡至巫峡中段进入湖北，过境流长1061公里，是湖北境内最大的水上航道，也是连接下游吴越与上游巴蜀乃至西北陕甘、西南云贵间的交通大动脉。六朝唐宋时期，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长江在全国交通地位也随之抬升。尤其是南宋定都杭州、元明清三代定都北京，大运河成为首都粮食供给的重要渠道，长江水道则成为转运漕粮的交通大动脉，同时也进一步带动了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长江沿岸的一些城市如沙市、宜昌，尤其是武汉的繁荣。武汉是当时转运漕粮的重要中转站和文化中心。近代，又随着京汉铁路以及粤汉铁路的通车，连接南北的主干线由鄂中移到鄂东武汉一线，进一步造就了大武汉的中心地位。交通对文化，尤其是文化中心的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二 中心变迁与传统文化转型

（一）远古时期文化重心向东移动

从现有资料来看，湖北地区时代最早的人类生活在鄂西山区的深处，如200万年左右建始直立人和100万年左右的学堂梁子郧县人就分别发现于鄂西南的建始县和鄂西北的郧县。荆州鸡公山旧石器时代平原居住遗址（约距今5—1万年）的发现，则表明旧石器时代晚期远古人类开始从山区走向平原，远古文化重心开始由西向东迈出了转移的步伐。

新石器时代，城背溪文化至大溪文化时期（约距今8000—5000年），湖北地区的远古文化重心已在鄂西山地向江汉平原过渡地带的宜昌、宜都、枝江等县市，以大溪文化为特色的枝江关庙山文化遗存，其聚落足可与关中的仰韶半坡遗址比美；到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时期（约距今5000—4000年），远古文化的重心则转移到江汉平原地区京山、钟祥、天门一带。江汉平原的先民筑有多座古城，比同时期其他地区的古城都多，最大的是与中原龙山文化同时的具有文明中心性质的天门石家河古城，还有精美的石钺和玉雕，应出自土著先民“三苗”之手，为湖北文化的继续发展奠定了较高起点。这是湖北最早的文化重心的迁移。

（二）夏代至战国中期文化中心的变迁

这个时期，从中原移居湖北的先民最有影响的有三次。第一次是夏初禹征三苗以后，芈姓楚先南迁湖北地区，先后居汉水西部地区（包括汉北丹、汉二水间地带）；^[1]第二次是商代中期，商人为加强对南方的控制而移民湖北地区，并在汉东建立据点，即盘龙城；第三次是西周时期，周天子移民湖北地区，建立随国等“汉阳诸姬”，用以加强对江汉地区的控制。这三次移民先后造就了汉水以东和以西两大文化区。汉西区的文化发展进程是楚文化特色逐渐浓厚。汉东区，如盘龙城（商代）、随国所分别呈现出的商文化和周文化特点比较明显；春秋中期以后逐渐融入楚文化之中。与此

[1] 罗运环：《楚国八百年》，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2页。

同时楚国向外加强拓疆力度，疆域扩展北至豫中地区、南至五岭一带，东至淮、泗流域、长江下游的鲁东南和江浙地区，向西其势力影响直至汉水上游和云贵高原，据有中国半壁河山，从而形成了远远超出湖北的楚国大文化（简称楚文化）。

楚文化是中原文化与江汉土著文化融合为基础，随着新地域的扩展而不断充实、升华所形成的一种中国特色的地区文化。其文化地域虽然广阔，但秦国白起拔郢以前其文化中心的移动一直在汉西地区，呈自北向南的移动走向。商末楚君鬻熊建国时都城在丹阳（今河南淅川境内），其子熊丽南迁沮水荆山之间，后世继续南迁，最后定都于今荆州纪南城，名称“郢都”。楚文化在此得楚国腹心地带之利，持繁华的郢都之重，吸收四方文化之精华，形成楚文化中心。其高度发达的文化足可与其同时期西方的希腊罗马文化相媲美。

（三）战国晚期至秦汉时期文化复苏和文化重心向北移动

战国后期，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白起拔郢，楚国东迁陈城（今河南淮阳县），楚国文化精英亦随之东迁，湖北地区的文化遭到削弱，直到汉代尤其是东汉时期这种精英文化才逐渐复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鄂北的襄阳地区。襄阳是由渡口城镇发展起来的，两汉时期其北的南阳郡城（治宛城，今河南省南阳市）发达，而襄阳仅为南郡属县，其地位并不显著。东汉末年献帝时中原大乱，刘表为荆州牧（190—208），据有荆州，以襄阳为州治，建学校，兴儒学，中原士人为避战乱，大量涌入，著名学者司马徽、宋忠、綦母凯、颖容、王粲等均在其中，襄阳一时人文荟萃，名士辈出，王粲称“士之避乱荆襄者，皆海内之俊杰”（《三国志·王粲传》）。此时的襄阳不仅是包括湖北在内的荆州的文化中心，同时也是全国的文化中心。14岁的诸葛亮就是随叔父诸葛玄由山东辗转至襄阳，投靠荆州牧刘表，并在襄阳学习成长起来的。后来三国分争，魏、蜀、吴都从当时聚集在襄阳的士人中吸取了大批的政治、军事人才，使湖北成为三国文化富集地。

文化重心向北转移，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中原战乱而荆州安定之外，鄂北枣阳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出生地，为帝乡所在，发展速度快。同时襄阳为中央王朝首都洛阳向南交通的枢纽之地，军事要冲，经济本来发达，